

# 读《史记·夏本纪》之德流苗裔

徐日辉

大禹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治水英雄,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象征,<sup>[1]</sup>大禹治水,是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伟大壮举,中华民族征服大自然的自信心表现,其“德治”又为古代帝王所推崇的楷模。实际上,“大禹治水是一次关系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事,作为受益的后人,有责任完整完整地传于后人,使之千秋万代,永远铭记”。<sup>[2]</sup>

目前,有关大禹治水的历史记载,毫无疑问当数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最为全面。按照《史记》的五体义例,《夏本纪》本为记载夏王朝历史的专篇。然而,《夏本纪》的核心却是大禹治水,突出的是大禹治水的英雄事迹,成为一部歌颂大禹的治水史诗。《夏本纪》全纪正文3028字(未计太史公赞),其中记载夏禹治水的事迹为1376字,占全篇的45.4%;若加上禹的施政事迹,则占全篇50%以上。<sup>[3]</sup>这在司马迁撰写十二本纪当中是唯一的。3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读《夏本纪》的札记,近年来再读《夏本纪》,仍有所得,现整理如下,望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 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大禹在治水的同时,十分关注水利灌溉的作用。大禹治水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水资源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且有所改革,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后人为什么如此地崇拜大禹,依我看不仅仅是单纯的治水,还与发展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楫。……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按:夏朝建立在中原地区,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生产力水平,并且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大禹不但是治水英雄,而且还是立农为国的名君。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大禹还采取了类似今天的移民措施,如“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sup>[4]</sup>通过人口的流

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压力,解决了人民的生活问题。)

史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sup>[5]</sup>“躬稼”就是重视农业生产。为了发展农业提高生产水平,当时还颁布了历法——《夏小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夏历。夏历的实施,不但是天文历法的一次革命,同时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到新的历史水平。因此来讲,自夏代以来中原已经形成了以农立国、以农兴国的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正因为农业是国家的生命线,所以,与农业相关的国计民生在大禹那里都变得十分重要。以饮酒而论,文献记载,酒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就已生产,发明者据说是一个女人叫做仪狄,她曾经将美酒奉献给大禹,大禹饮后虽然口感不错,但他考虑到酒是由粮食加工而成,而当时的粮食产量又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并且认为:“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sup>[6]</sup>酒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表现,酒的发现丰富了人们日常的饮食生活和文化生活。酒作为饮料,在中国起源很早,是世界上酒的发源地之一,至少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考古发现,以山东为中心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内,曾经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其品种有鬯、背壶、瓶、高脚杯和筒形杯等。<sup>[7]</sup>其中鬯的造型十分优美。另外,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也出土一件非常精美铜爵。<sup>[8]</sup>有学者考察后认为:“我国最早的青铜酒礼器是在国家建立后创造发明的,是中国酒礼器的源头所在”而“夏代铜爵是中国青铜酒礼器之源”。<sup>[9]</sup>并且被认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青铜文明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sup>[10]</sup>二里头是典型的夏代的文化,由此可见酒早在夏代就已经相当发达了。从大禹拒绝美酒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多了一项内容,那就是人们所有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与政治相关,再没有单纯的社会活动了。从此以后,人们将酒与道德礼仪社会政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提高到了国家兴亡的地步。

古人之所以把酒提到与国家兴亡的地位,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酒是以粮食为原料的,所以,大量消耗酒的背后是十分可怕的粮食危机。因此,当大禹第一次喝了仪狄酿造的美酒之后,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大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多数人尚不能果腹,而少数人则以消耗大量的粮食用作奢侈,其结果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动荡也就随之诞生了。从禹是反对造酒的资料分析,当时用酒数量之大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而他所担心的不幸被言中,而且就发生在他的后代身上。

史载禹的儿子启“湛浊于酒”,孙子太康“甘酒嗜酒”,夏桀“荒耽于酒”,作王的人嗜酒如命,而且是前赴后继连续不断,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嗜酒之风,从而加速了政权的衰亡。

《说文解字》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因此,孟子赞扬禹的做法是圣人之举,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sup>[11]</sup>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象征,除了他治水之功,为民造福使“诸夏艾

安”之外，<sup>[12]</sup>又能从国家长治久安和净化社会风气出发，拒绝嗜酒，远离侈靡，这也是他“民好明德，顾在天下”，<sup>[13]</sup>所以被千古颂扬的重要原因。

## 二、以德治国的典范

夏禹，是政治家们树立的“德政”圣贤，是以德治国的典范。《尚书·吕刑》记载：“黄帝清问下民，罔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稼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这段话，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其“三后”指的正是大禹、伯益和后稷这三位首领。

大禹正因为具备了这种有德于民为民父母的高尚品行，才被奉为历代君王学习的楷模。从遂公盨铭与《吕刑》结合看“德主刑辅”的思想早在禹时期就已经形成，而且一直是作为治国的宗旨来实施的。后来儒家又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成为治国安邦的标准。所以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兴焉……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sup>[14]</sup>何谓“无间然矣”？杨伯峻先生释为：“禹，我对禹没有批评了。”<sup>[15]</sup>能让孔子没有批评意见的人确实不多，纵观一部《论语》仅有几人而已。为什么孔子如此推崇夏禹呢？关键就是有“德”。这个“德”不是空洞无物的“德”，而是在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的“德”。孔子说夏禹富有天下而不为自己，贵为天子却为平民勤劳。宁可自己吃得很坏，也要丰盛祭品；宁让自己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十分华美；宁可自己住得很差，却把精力全用在治理国家治理水患上。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史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等，<sup>[16]</sup>这才是“德”，才是“仁”，才是“德政”。孟子则云：“禹闻善言则拜”，<sup>[17]</sup>“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异地则有然。”<sup>[18]</sup>他又“不善人远”，<sup>[19]</sup>且尊师“大成执”。<sup>[20]</sup>其言行举止合乎于教，合乎于礼。所以《礼记》曰：“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合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志也。”礼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衡量个人品德的最高标准，是以尊禹为楷模之首，然后才是“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司马迁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禹建夏朝，最根本的是为人民解除了水患和实施“德政”，故而才深得民心、才昌兴不衰。他所以不惜笔墨详述禹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史实，目的即此。

司马迁在《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提出治理国家应讲“仁”讲“德”。他说：“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对于帝王更应该“辅德”。他自己就是“予思日孳孳”。何为孳孳？大禹在回答皋陶时说：“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犂，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

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皋陶听后连声称：对，这便是你的美德。司马迁用事实赞誉大禹，以天下为己任来宣扬大禹。他总结道：“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sup>[21]</sup>可谓一言中的。所以，李学勤先生认为：“盨铭所以要讲述禹的事迹，是以禹作为君王的典范，说明治民者应该有德于民……‘成父母’就是说禹大功于民，为民之父母，与《五德帝》中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相合。”<sup>[22]</sup>曹植称赞大禹是：“厥德不回，其诚可亲。亶亶其德，温温其仁。”<sup>[23]</sup>其仁德之君跃然纸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刑》中所反映的“德政”思想已经从新出现的遂公盨铭中得到了证实。

### 三、出土器物的启示

大禹建立夏朝已为公认，并且已由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给出了确切的年代。<sup>[24]</sup>大禹以“德治”为本治理国家，是传统的说法，至少在司马迁以前就已经存在。作为实物，最近出现的遂公盨将禹的事迹前提到西周中期。遂公盨全铭98字，前9行每行10字，末一行只有8个字。其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与《禹贡》之“禹敷土，随山浚川”、《书序》之“禹别九州，随山浚川”完全相同。而“厥贵唯德，民好明德”<sup>[25]</sup>，则清楚地表明早在大禹时期就已经在实施“有德于民”的“德治”观，由此可见，人们热衷于西周的“德治”，实际是上来自于大禹，所以，周人将其刻在食器上，就是念念不忘“德治”的重要。

除了最近出现的遂公盨与夏禹德政文献相印证之外，还有著名的秦公簋和齐公钟。

秦公簋。秦公簋，1919年出土于甘肃的天水西南乡，即今天天水市西南秦城区所辖的秦岭乡庙山一带。秦公簋，双耳，分盖与器，均饰瓦纹，口饰蟠螭文，盖、器共105字。另外刻18字，合计123字。其铭曰：“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鬲禹宅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虢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烈烈桓桓，万民是救。”<sup>[26]</sup>在秦公簋的铭文中不但明确地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历史事迹，同时也表明秦人是禹的后裔，“也就是说，秦人自称是华夏族。”<sup>[27]</sup>其实秦人本身就是华夏族的成员，只是长期生活在西戎地区，被中原误解为戎狄而已。

齐侯钟铸凡492字，与秦公簋一样系春秋时期器物。依据郭沫若先生的隶定，其中涉及大禹的铭文有：“兢兢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刻伐司，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郭沫若还认为：“成唐即成汤，伊小臣即伊尹，禹即夏禹。”<sup>[28]</sup>对于秦公簋之“鬲禹宅迹”，王国维认为：“亦犹，《鲁颂》言‘缙禹之绪’也。”<sup>[29]</sup>郭沫若亦称：“‘禹贡’即《大雅》之‘维禹之绩’，《商颂》之‘设都于禹之迹’”。他还指出：“上言‘禹迹’，下言‘蛮夏’，则夏与禹确有关系。”<sup>[30]</sup>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禹是建立夏朝的关系。

纵观遂公所作盨铭,其中心思想是以德为主,突出“德治”的重要性,其上接禹的思想,下启秦公簋、齐公钟铸之禹迹,且与文献相合。在遂公盨出现以前有关禹的金文一直仅限于春秋时期的秦公簋和齐侯钟铸这两件器物,而且在时间上相当要晚一些。此次遂公盨的出现,将大禹治水的记载前提到西周时期,从而使西周至春秋时有关禹的金文有序地连成一线,不但脉络清晰而且可以看出大禹治水流传的历史规迹,是为有章可循的二重之证。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大禹不仅仅是德政,同样使用专政手段,特别是在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前提下。考察表明,当时已经有职掌墨(黥)、劓(义)割鼻子、刖(砍断脚)、宫、大辟(死刑)五刑的官员。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sup>[31]</sup>。但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德与刑的关系,所谓“夏禹始作肉刑,则天象而慎其过。”<sup>[32]</sup>可见,大禹并不放弃法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很强硬。司马迁曾经借用汉初政论家陆贾的话说:“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以亡,故虐刑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sup>[33]</sup>在对待礼义道德与峻法苛政的认识上,司马迁吸取了孔、孟学说的成分,丰富和完善自己的黄老思想,总结出德为本、刑为辅的治世观。

从根本上讲,司马迁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生存的角度出发。所谓“太上神化,其次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sup>[34]</sup>因此,他主张从感化人民,在行为上教化人民,主张用仁义礼智信来限制人民,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他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sup>[35]</sup>坚决反对唯法嗜法,反对用刑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发展到只剩下用专政工具来对付人民、维护统治的时候,国家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因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崩溃。他引陆贾的话讲“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亡赵氏”。<sup>[36]</sup>赵氏即秦王嬴氏。认为道德与法,是“在彼不在此”的本末关系。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sup>[37]</sup>又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sup>[38]</sup>。孟子认为:“以力服力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之子服孔子也”。<sup>[39]</sup>

大禹治水,是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自信心表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其“德治”又为古代帝王所推崇。作为司马迁记载夏代历史的重要篇章,他在《夏本纪》中重点突出了大禹的仁德绩业,是他“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观点的具体表现。司马迁认为:政权的兴衰王朝的更替与个人的品行关系密切,夏代之兴,就是大禹十几年如一日为民造福的“德政”回报,而不是什么天赐良机。他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多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sup>[40]</sup>并且发出:“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有择任将相哉”的长叹。<sup>[41]</sup>

司马迁推崇三代,认为三代之兴是累世积德行善、施仁惠义的结果。司马迁赞美大禹,他如椽之笔的载述,使大禹精神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楷模,司马迁熔铸人们实

际治水的经验,通过大禹治水的业绩,歌颂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伟大壮举,歌颂夏王朝开国之君的仁政德行,而遂公盨、秦公簋和齐公钟罍的出土无疑为司马迁盛赞大禹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佐证。而遂公盨的出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德政兴于夏禹的历史功绩,包括大禹“德流苗裔”之越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注释

- [1]徐日辉:《论司马迁的地理思想》,载《青海师大学报》1984年5期。
- [2]徐日辉:《从大禹治水到中华民族的精神聚合》,载《地球科学—水与城市》,地质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 [3]徐日辉:《读〈史记·夏本纪〉札记》,载《天水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 [4]《史记·夏本纪》。
- [5]《论语·宪问》。
- [6]《战国策·魏策》。
- [7]于中航:《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第34页,齐鲁书社,1979年版。
- [8]奚传绩编著:《中国美术七千年图鉴》第1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9]高西省:《夏代铜爵:中国青铜酒礼器之源》,载《寻根》2006年2期。
- [10]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反映的河洛文化历史地位》,载《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1]《孟子·离娄下》。
- [12]《史记·河渠书》。
- [13]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
- [14]《论语·泰伯》。
- [1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4-8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 [16]《史记·殷本纪》。
- [17]《孟子·公孙丑上》。
- [18]《孟子·离娄下》。
- [19]《左传·宣十六年》。
- [20]《吕氏春秋·尊师》。
- [21]《史记·太史公自序》。
- [22]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
- [23]《艺术类聚》卷十一。
- [24]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88页,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
- [25]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
- [26]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载《陇南丛书》,1944年版。



- [27]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第20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 [2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29]王国维:《古史新证》第1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3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31]《左传·昭公六年》。
- [32]《风俗通义·佚文》。
- [33]《新语·道基篇》。
- [34]《淮南子·主术》。
- [35]《史记·太史公自序》。
- [36]《史记·陆贾列传》。
- [37]《论语·为政篇》。
- [38]《孟子·公孙丑》。
- [39]《孟子·公孙丑》。
- [40]《史记·六国年表序》。
- [41]《史记·匈奴列传赞》。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